

· 王安忆 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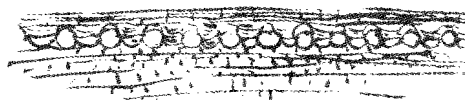
七月在野
八月在宇

1267
2772

I 267
2772

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

· 王安忆 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/王安忆编. —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10.3
ISBN 978-7-5033-2250-1

I. ①七… II. ②王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19241号

书 名: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

作 者: 王安忆

责任编辑: 杨潍虹

E-mail: eywh@sina.com

装帧设计: 苏 馨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150千字

印 张: 7.25

印 数: 6000册

版 次: 2010年3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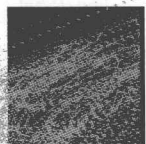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33-2250-1

定 价: 18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华丽家族



华丽家族

一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我读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小说，感受相当单纯，那就是“享受”。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，径直进入故事。她不会让你失望，一定会有神秘的死亡发生，然后，悬疑一定有答案。好比波洛在他的事务所里等待案件，而终会有案件找上门来。你不必去推敲，难道真的会有如此多的谋杀案件？因为这是与现实无关的，你早已经卸下现实批判的武器，身心轻松，只等着听故事。可是，事后要细究起来，却发现故事中人，分明又是生活中的面目，情节也是根据日常的情理，是你我他全能了解的。反倒是那企图超出共识的现实，比如少数几部间谍故事，震惊的效果比较减弱。所以说，这些令人着迷的故事，其实是囿于现实，在生活的范围内索取材料。也所以，要是检点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故事，你又会发现，故事的要素很简单，不外是争夺遗产，欺瞒历史，谋骗钱财，恩仇相报，然后再派生出敲诈，灭口，掩藏。人物呢，又总是一个家族，一间寄宿舍，一艘游轮或者一列客车，甚至只是一个晚会和一餐宴席。这多少也能看出女性写作者较为狭小的社会以及居家的性格。就是这些简要的因素，却组织出这许多故事。这又使我想到女性的另一项技能，就是编织的技能——竹针，毛线球，编织法，竟可以生发出无穷无尽的花样。那乡下

老太婆马普尔小姐，从不离手的毛线活，大约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手里的活。这还像一种小孩子的挑绷的游戏，将一根棉线对头打个结，双手撑开，挑出一个花样，再由对方挑过去，形成第二个花样，两个人挑过去，挑过来。倘若是聪明的小孩，可挑出无数种图案，而要是笨小孩，没几个回合就挑成一团乱麻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就是那个顶聪明的挑绷能手。她用有数的条件，结构出大量的谋杀，线索错综复杂，就像编织活和挑绷上美妙的经纬组织。这些线条和结

构，一旦以日常生活的材料，这种材料的目的，是



能够将一切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。而且，她不是求精辟，而是务实际，就像方才说过的，倘若阿加莎·克里斯蒂要讲述一个超出常理的故事，比如间谍类的，

《暗藏杀机》《犯罪团伙》《桑苏西来客》等等，无论是罪行也好，侦破也好，所根据的理由就都悬了，显见得不是她的强项。我觉得，马普尔小姐的案件最能体现阿加莎·克里斯蒂故事的性质，那就是她在《平静小镇里的罪恶》中说的：“一年到头住在乡下，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。”阿加莎·克里斯蒂编织故事的线索，究其底就是“各种各样的人性”，而且就是在

“一年到头住在乡下”所能看到的人性。因为，马普尔小姐坚信一条：“人性都是相通的。”由此可见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笔下的犯罪，都是出于通常的人性，绝不会有现代犯罪的畸形心理。比如像英国当代推理小说女作家，露丝·蓝黛儿所写《看不见的恶魔》

（台北新雨出版社），那个老罪犯，专门在黑暗的狭长的街道上，袭击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，当他在公寓地下室发现一具同类形象的模特儿之后，便将袭击冲动转向这个橡皮人，因地下室亦有着黑暗、狭长的空间，能够让他在渐渐逼近对象时，积蓄起兴奋感。不幸的是，这具橡皮模特儿被小孩子在游戏中烧毁，于是，地面上就又开始发生一连串的谋杀案。在此，谋杀便成为一种奇异的癖好，说是谋杀犯，其实倒更像是一个病人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谋杀则有着常规的理由，悬念的设置和解答都不超出普遍人性

的范围，而且一定解答透彻，也就是“解释得清清楚楚”。在《藏书室女尸之谜》中，马普尔小姐说过一句：“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比较懂得人性。”那是老派的人性观念，是经验主义的，可是很管用。比如，《命案目睹记》，马普尔小姐说：“我的一大优势是了解埃尔斯佩思·麦克利卡迪太太……”埃尔斯佩思·麦克利卡迪太太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，所以，她说她看见了一桩谋杀案，那可能真的是发生了谋杀案；比如，《藏书室女尸之谜》，班特里上校古色古香的书房里，躺着一具打扮花哨的女尸，形成一幅“不真实”的画面，而马普尔小姐看着女尸良久，轻声说：“她很年轻。”她注意的是那种个人性质的因素；在《寓所

智力水平。波洛不像马普尔小姐，是从具体性入手，而是从抽象着眼。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着相对于内部性质的外部形式，外部的变形，往往可能意味着内容的转化。中篇小说《死者的镜子》里，引他注意的是，自杀人的姿势多么“不舒服”，那么就是说，死者可能应合着另一种性质的死亡。波洛特别讲究事物的排序，排序完成，真相就显现了。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里，他说：“我们知道的很多，可是逻辑上没有连贯，”这就是说，排序出不来。在此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体现出逻辑性极强的头脑，就像原始人陶罐上的雷电纹，鱼形纹，意味着有能力将具体的印象归纳概括成抽象的形态，思维发生了本质性的进步。所以，在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小说里，生动的人性情节底下，其实网络着一个图案形式，这个图案有序的变化，将具体的人性材料演变成种种形式。波洛喜欢将自己的推理形容为“拼图游戏”，在《阳光下的罪恶》里面，他向正玩着拼图游戏的加德纳夫人描绘他的劳动：“您得把所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。最后的成品像镶嵌画一样包含有多种颜色和图案，每一块奇形怪状的碎片都必须被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。”有时候，会发生假象，就是说，有一块“按颜色本该属于毛毯的一部分，结果却被用来构成一只黑猫的尾巴”。事情常常是这样，波洛手里握着一块碎片，看起来似乎和整个事件并不相干，可就是这块碎片，“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”，真相就显现了。比如，《清洁女工之死》

里边，首先引起波洛注意的是，从来不写信的老妇人麦金蒂太太去买了一瓶墨水；《牌中牌》里，桥牌局中，罗伯茨医生莫名其妙地叫了“大满贯”；《哑证人》则是，小狗鲍勃一夜在外，它的玩具球却在楼梯上……这块碎片，从事实上脱落，最终又回进事实，“终于各就各位”，复原了事实的全貌，依然是具象的生活。就好比一个关于拼图的小故事，小男孩拼一幅世界地图的拼图，他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拼成，却原来，他是反过来拼的，反面是父亲的照片。我想用这个故事证明的是，在逻辑形式的外部，还是表情活跃的人性面目。

在马普尔小姐主持的案件中，其实也隐匿着一个形式，不过她的形式更具有生活的状态，比如说“歌谣”——《黑麦传奇》中，马普尔小姐意识到这桩案子中藏着一个模式，就是那支歌谣：“唱个歌儿叫六便士，一口袋黑麦，二十四只黑画眉烘在一个馅饼里，馅饼一切开，鸟儿便歌唱，多美丽的一道佳肴献给国王尝！国王在账房数金币，王后在客厅吃面包涂蜂蜜，女仆在花园里晾衣，一只小鸟飞来，叼走了她的鼻。”这就是马普尔小姐所破译的犯罪模式，比较波洛的更有人的性格。

《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》是一部故事集，共有十二个故事，可明显看出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形式感。赫尔克里·波洛和万灵学院院士伯顿博士聊天，聊到名字的话题，伯顿博士的意思是给小孩子起名要

当心，因为常常事与愿违，他认识一个以女神戴安娜名字命名的孩子，小小年纪体重已经达到二百四十磅。波洛的名字“赫尔克里”与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同名，大力神是主神宙斯的孩子，以十二项丰功伟绩闻名。波洛要纠正伯顿博士的成见，为自己正名，决定挑选十二桩精品案件，每一桩都必须对应大力神的丰功伟绩。于是，就有了《涅墨亚狮子》《勒尔那九头蛇》《阿卡狄亚牝鹿》《厄律曼托斯野猪》等一共十二个故事，每一个故事都有着相应的模式。比如《赫思珀里得斯的金苹果》，在希腊神话中，是关于赫尔克里与背负苍天的阿特拉斯的一场斗争。赫尔克里接过阿特拉斯背上的苍天，让阿特拉斯去偷金苹果，阿特拉斯偷来金苹果后，却不愿再接回沉重的苍天，赫尔克里便施计让阿特拉斯重新背负上苍天，自己拾起了金苹果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将金苹果换成了金杯，这金杯除去有显赫的历史而外，本身也十分精致，上面雕了一棵苹果树，挂了绿宝石的苹果，在它从一名侯爵手中转向金融巨子的当口，被国际盗窃团伙拐走，最终，它当然被波洛找到了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探案小说，在严格的抽象形式和生动的具体情景之上，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——《神秘的别墅》里，新婚的格温达·里德要为他们的小家觅一处住宅，当她看见那一幢维多利亚式小别墅的时候，忽然就认准这是她所要的房子，一切都令她熟悉和亲切，甚至是她可以想象的，这一点很

快被可怕地证实了。她想象卧室里有一个壁橱，果然就有一个；她想象壁橱里应该是小罂粟花和矢车菊的糊墙纸，果真就是小罂粟花和矢车菊的糊墙纸……再有，《命运之门》，托马斯·贝雷斯福特太太整理新居，在旧房主留下的藏书上发现有蓄意画下的字母，拼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：“玛丽·乔丹并非自然死亡。凶手是我们中的一个，我想我知道是谁。”——这几乎有一些《呼啸山庄》的意思了。还比如，《斯塔福特疑案》，玩灵桌游戏，召来名叫“艾达”的精灵，带来口信，特里维廉上校被谋杀，事实果然是特里维廉上校被谋杀。这里透露出一股来自哥特小说的惊悚空气，决不会演变成《呼啸山庄》那样痛楚伤人的悲剧，而是正好到激起兴奋为限，表现出女性仁慈的性情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也有着大多数女性都有的喜好，就是对神秘事物心向往之。这大约来自于一种女性祖先的遗传，在足不出户的生活里，生出对世界又好奇又恐惧的幻想。那鬼魂与精灵大多活动在封闭的室内，带着家族的徽印和训诫，试图对种种现象作出道德说教。《死亡之犬》中的十二个短篇小说，多是灵异故事。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这一本短篇集里，也有两篇灵异故事，其中一篇名叫《裁缝的洋娃娃》，不仅是神奇，而且非常动人。那一个洋娃娃，谁也不记得它是几时，又是如何来到了伦敦艾丽西亚·库姆小姐的裁缝铺子里，她躺在天鹅绒的椅子上，和房间里的家具摆设格调匹配，加上它那

副懒散的态度，“看上去好像她才是这儿的主人”，裁缝铺子里的女人们感到了不自在。又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的，它坐在了试衣间的书桌前，好像在写信。女人们都被它乱了心思，记性变得很差，总是找不到东西，也集中不了精神工作，清洁女工不愿意来打扫卫生，因为感到气氛古怪不祥。最后，它终于惹火了艾丽西亚·库姆小姐，她将它从窗口扔出去，扔到了马路上，被一个小姑娘拾走，小姑娘抱住洋娃娃说：

“我告诉你们，我爱她，而这是它想要得到的，她想被人爱。”这一个灵异故事里的惊悚意味被处理得相当微妙，顺便说一句，洋娃娃也是灵异小说里的重要道具之一，在此，它却一反以往，从邪恶中脱身，走入一个抒情的结局。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中的另一篇灵异故事《神秘的镜子》，气氛要阴森一些，惊悚的效果更强烈，情节亦要复杂。它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，“我”宿在朋友家的客房，从镜子里窥见身后墙上洞开一扇门，门里正上演恐怖的一幕——朋友的美丽的妹妹西尔维亚，被一个男人扼住喉咙，男人左脸上有一道疤痕，使他看起来十分凶恶。“我”将这一幻象告诉了西尔维亚，于是，西尔维亚解除了婚约，因为她的未婚夫和镜子里的男人一样，左脸上有一道疤痕。后来，西尔维亚和“我”结了婚，可“我”其实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，有一次，妒嫉心大发作，扼住了西尔维亚的脖子，就在这时，“我”从镜子里看见了多年前那个幻象，那个左脸有伤疤的男人正是

“我”，因镜子反射的缘故，左脸上的伤疤实是在右脸，而“我”在战争中右脸被子弹划伤了。这个恐怖故事的结局是，“我”震惊地松开手，认识到心中的“恶魔”，从此与妻子相谐相伴，永不相疑。神秘的预言最终成为道德的警示，及时挽回事态，使善心得到发扬。这大约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教养，对邪恶有天然的忌讳，不忍看人难堪，尤其是体面的人，于是，尖锐的冲突便在她们的慈悲心肠下化险为夷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小说，在经历了残酷的谋杀和慎思严行的侦破之后，总是将结局引向大团圆，用马普尔小姐在《平静小镇里的罪恶》里说的话，就是——“一切都以最好的方式有了结局”。凶手多半是天性卑鄙，犯罪是他们必然所为，受罚则天经地义。比如《古墓之谜》中，阳险的利德勤捕头，

个人品行的缘故，所以就可以放心地让她犯罪了。“女伴”，在阿加莎·克里斯蒂生活的时代里，真是属于一个较低的阶层，《葬礼以后》里，女伴吉尔克里斯特小姐，为实现开一片小茶馆的夙愿杀了人，人们甚至不惜残酷地寻吉尔克里斯特小姐开心，说她在监狱里已经精神错乱，正兴奋地筹划开茶馆，这一片茶馆的名字叫“紫丁香丛”。而那些令人扼腕的罪犯，出身于好人家，有好身份，有着可以理解的犯罪原委，特别是女性，这样的故事往往是哀婉的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总是让他们服用药物自杀，即可免于受审的羞辱，又怀有着一种殉节的姿态。例如，《空幻之屋》里温良的妻子格尔达，爱她丈夫爱到膜拜；例如《哑证人》里，为让她的宝贝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母亲，塔尼奥斯夫人；比如，《悬崖山庄奇案》中企图谋取表妹财产以拯救家业的尼克·巴克利小姐；或者像《迟来的报复》中不幸的女明星玛丽娜·格雷格，是被爱她的拉德先生安排无痛苦地进入睡乡，长眠不醒；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，詹姆斯医生写完他的犯罪自述，准备服安眠药了，他最后写道：“安眠药？这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公正的处罚。”再有，《古宅迷踪》，弗利亚特太太庇护儿子的谋杀计划，为了夺回失去的纳塞庄园，那儿子从来是个坏料，没什么可说的，母亲却依然是这个光荣的古老家族的女儿，面对前来控罪的波洛，她沉着地说：“谢谢你亲自到这里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。现在你就要离去了吧？有些事情，一

个人是不得不独自前去承担的……”虽然没有明示何种惩罚，至少是让弗利亚特太太保持了尊严。至于那些无辜受惊受磨难的人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一定要给予补偿，这补偿基本是好婚姻和好出身，比如《云中奇案》中，纯真的格雷小姐，经由波洛撮合，与前途远大的让·杜邦考古学者开始了交往；《怪钟疑案》的希拉小姐，最终证明了她诞生于合法婚姻，父母都是可尊敬的国家政要部门人员，自己也与高层特工科林先生缔结良缘。这里确有一些儿偏见，但还有着对

二、波洛

在这一章节的开始部分，我要说明我所阅读以及在此使用的材料来源，就是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的《阿加莎·克里斯蒂作品全集》。这是迄今为止收集最多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中文作品集，对照其中《阿加莎·克里斯蒂自传》

“译者前言”中所统计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一生写作有“八十多部长篇小说，一百多个短篇，十七部剧作”，这里并非如标明的那样是“全集”，相信编译者自有删取的理由。但我还是必须承认我的阅读是有限的，所以，我的评析就只是在有限的范围中进行，忽略与偏颇在所难免。在这套作品集中，总共有长篇小说六十七部，中短篇小说集十一部，共计一百一十四篇，再有两部纪实散文，一是《情牵叙利亚》，一是《阿加莎·克里斯蒂自传》。其中，由波洛主持侦破的故事有三十二部长篇和四十个中短篇，几近一半，他当然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男主角，我就我能了解的事实来对波洛作一个画像。

显然，波洛是在《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》中首次亮相。其时，正是在战争中，他和他的比利时同胞，总共七人，在英国偏僻乡间斯泰尔斯避难，受到斯泰尔斯庄园的主人英格尔索普太太的照应。他的形象有点滑稽：小个子，却表情威严，圆圆的脑袋，时常向